

評《〈客家空間〉的生產： 梅縣「原鄉」創造之民族誌》

陳麗華

書評：河合洋尚著、邢光大譯，2026，《〈客家空間〉的生產：梅縣「原鄉」創造之民族誌》。苗栗縣銅鑼鄉：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；臺北市：南天書局有限公司。

廣東梅縣真的是大眾印象中的「客家原鄉」嗎？日本學者河合洋尚在《〈客家空間〉的生產：梅縣「原鄉」創造之民族誌》中，挑戰了這一既定觀念。他巧妙地設計了一個雙元分析框架，一方面關注 1980 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，梅縣的建築、信仰與習俗，如何在當代政治經濟條件下逐漸被賦予「客家」意義；另一方面則透過細密的田野調查和民族誌，呈現了當地豐富多元、難以被「客家文化」歸約的日常生活實踐。二者之間的析分、抗衡乃至轉化的多重辯證關係，是本書最精彩的部分。

河合洋尚在早期對日本華僑與廣州華人社會的研究中，便已察覺到梅縣作為中國著名客家聚居地的獨特地位。然而，真正吸引他傾注全力投身梅縣客家研究的，則是客家人跨越國界、在全球間流動的特質。書中舉了一個饒富趣味的例子：作者首度在梅縣受邀赴宴，滿心期盼一嚐道地的客家佳餚，未料席間端上桌的，竟是南洋風味的咖哩與印尼沙拉（加多加多）。他意識到，他遇到的並非是客家文化，而是梅縣的地域文化，這一文化是透過人們的移動帶來的，交織了諸多不同地域的物質、民俗與資訊。

追溯起來，此一視野宏大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取向，深植於河合的學術傳承脈絡。他師承以東亞風水研究聞名的渡邊欣雄教授，渡邊早年即以臺灣屏東客家村落為田野起點，其後將研究範圍擴及東亞各地，並持續關注家屋、墓葬等物質空間與人們精神世界的互動關係。本書對空間、建築與文化實踐的細緻分析，多少



也反映出這一學術背景的影響。若再進一步追溯其學術淵源，渡邊欣雄的老師馬淵東一，早年是臺北帝國大學「土俗人種學教室」唯一的畢業生。該教室由移川子之藏於 1928 年創立，以臺灣原住民及環太平洋民族的比較研究見長。戰後，馬淵東一將此一強調田野調查與跨文化比較的方法帶回日本，並透過其弟子延續下來。近期作者亦將客家研究延伸至南美洲秘魯等地，正與其師門橫亙百年、環太平洋的比較視野息息相關。

若將本書置於客家研究的學術脈絡中考察，其問題意識可視為客家研究由「民系論」轉向「建構論」的延續與深化。1980 年代以來，越來越多人類學、歷史學、社會學、語言學者投入客家研究領域，透過深入的田野調查、拓展研究方法及重構解釋體系，亦陸續對此前先驗性的民系論提出反思，指出「客家」並非自古存在的客觀群體，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社會分類與文化認同，日本學者瀨川昌久、中川學等亦在其中，河合顯然承接了這一研究取向。不過，與其他學者的田野地點不同，他直接選擇了被視為「客家原鄉」的梅縣作為研究對象，亦有徹底檢討和重新反思近百年客家研究範式的意味。早在 20 世紀上半葉，近代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客家的鼻祖、歷史學家羅香林，便將客家界定為跨越 1,600 年光陰、歷經 5 次南遷、融合諸多民族血統而形成的漢人民系，亦詳述了其在中國東南沿海諸省及東南亞等地的分佈，其中梅縣便歸在廣東省下「純客縣」第一位，是客家文化的核心區。然而，憑藉長期田野調查經驗，河合認為梅縣居民的生活方式、文化實踐與身份認同極為多元，應首先被理解為地域文化，這也與人類學家勞格文（John Lagerwey）對中國東南部客家地區的觀察相呼應。「客家原鄉」的文化想像為何及如何在其上化為現實，便是本書的主題。

全書最重要的理論貢獻，在於他借用和轉化了法國哲學家亨利·列斐伏爾（Henri Lefebvre）提出的空間論觀點，將「客家空間」視為一個受國家權力、經濟與文化政策影響的符號化領域，官方與精英將客家文化作為資源，投射「根繫中原」的意識形態，用以吸引海外華僑投資與觀光客。與之相對的客家「場所」，則是一般民衆在日常生活中具體的文化實踐場所，它不止是物質存在，更蘊含了人們主觀的經驗與情感，無法被宏大的「客家空間」所歸約。不同的社會行動者在這些場域間穿梭，從而激盪出二者之間的互動模式與動態張力。

全書正文共有 7 章，從政策、宗族、儀式、風水、景觀、信仰、墓地等不同維度，剖析「客家空間」的生產與「場所」中的民間實態。改革開放後，海外華僑資金對梅縣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。在華僑尋根需求與地方發展策略的結合下，政府透過學術研究、教育、博物館、觀光與媒體宣傳，不斷強化梅縣作為「客家原鄉」的形象，形成具有政治與文化意涵的客家空間，但這與地方人士的日常生活場景及認知存在顯著差異；在宗族祭祀上，官方強調客家祖源與父系血統，但實際親屬關係及拜祭禮儀中，女性同樣具有重要地位；節慶儀式上官方推廣的「鬧元宵」被塑造成客家文化象徵，但地方宗族更重視新丁誕生、祖先祭祀與生命力的延續；風水地理論述常被解讀為中原文化遺緒，但當地人更關注土地、祖先與生命力之間的具體連結。在城市景觀與宗教信仰方面，政府與開發者透過興建土樓、打造文化園區及重塑宗教場所來彰顯客家特色，但居民反而重視原有的圍龍屋、祖廟與具有靈力的傳統場所，並在都市化過程中積極爭取保存。

在終章中，作者也指出「空間」與「場所」並非二元對立，而是相互影響的動態過程。地方主體可能主動利用官方的客家意識形態（空間生產），來合法保護自身的文化實踐與情感（場所守護）。第七章關於墓地的討論中，當地楊氏宗族結合客家文化論述與文化資產保護機制，透過主動生產符合國家需要的「客家空間」，來守護原本的場所及其蘊藏的良好風水，便呈現了最為鮮活的例子。最後，作者認為對於「誰是客家」的根源問題，回歸到主觀的自我認同更為適宜。

對於歷史學者而言，本書極具說服力地指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，梅縣作為客家「空間」建構的政治經濟背景與政治文化過程。它呈現的是對歷史橫切面的深入剖析，在這個制度化、全球化、觀光化的新時代，華僑與國家力量歷史性地結合，不但將各種不同來源的客家文化符號匯集至客都梅縣，亦使客家觀念深入民間社會。

然而，若追溯縱向的歷史脈絡，「空間」與「場所」的相互創造，可能早在 14-16 世紀客家人的醞釀階段，便已經不斷上演。梁肇庭、程美寶等學者的研究顯示，處於江西、閩南和東南沿海宏觀區域邊緣地帶的閩粵贛山區，人群構成極其複雜，既包括各種來源的移民，亦包含風俗語言各異的土著。但 16 世紀當他們向外移動的時候，已經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標記（如後來被稱為「客家話」的獨立方



言），這本身就是國家力量、經濟發展及地方社會不同群體互動的歷史結果。當傳統士人描繪當地「中原遺風」，或20世紀初政治菁英努力證明當地「血統純正」時，便已經用教化或種族的眼光，將千差萬別的地方文化收納進制度化空間的框架了。

同時，從全書的敘述來看，除第七章外，其餘各章仍傾向將「空間」與「場所」視為相對獨立、甚至隱含對抗的兩個範疇。但以梅縣的歷史經驗而言，地方社會從來不是一個與國家力量對立的純粹淨土。無論是定光古佛信仰、圍龍屋的空間觀、女性祖先崇拜，乃至宗族制度本身，皆非單純源自地方的自發創造，而是在漫長歷史中，受到國家權力、儒家禮制與移民活動共同塑造的歷史產物。「場所」並非獨立於「空間」之外，而是各種權力關係長期沉積、交互作用後的結果。

此外，書中不同立場的行動主體，是雙元分析框架運行的關鍵。書中多將「華僑」形塑為「他者凝視」的主體，但書中第二章張氏家族的案例卻展現顯示，其管理委員會同時包含印尼與香港成員，地方行動者仍主要將彼此視為「內部宗族成員」——即祖先分支的延續，共同承擔祭祖與修繕的義務，這意味著內部眼光的血緣譜系依舊在發揮作用，並未為國界所囿。同時，宗族成員常被視為場所中維繫地方文化傳統的主體。若引入英國人類學家斐利民（Maurice Freedman）的宗族光譜，梅縣的地方宗族（如張氏、楊氏）顯然更趨近於高度組織化、內部階級高度分化的「Z型宗族」。以爭取風水墓地保護的楊氏宗族為例，其成員不乏身居全國政協副主席、政府官員與學者菁英者。當「場所」中的關鍵行動者同時扮演著國家權力或意識形態的代言人時，這種原鄉重塑工程中的「中間人群像」，亦讓空間與場所的二分界限趨於模糊。

總而言之，河合洋尚這部民族誌以扎實的田野工作為基礎，穿透了宏大的客家文化框架，轉而深入地方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世界。透過對文化實踐與情感記憶的細緻描繪，不僅解構了本質化的族群論述，更深刻體現了人類學對在地精神世界的深沉關懷。這種強調人與物之間交織連結的視角，超越了人類與物質、主體與客體的二元論述。對於當前正在客家「空間」塑造路上、亟待重新反思空間與場所關係的臺灣而言，此書無疑深具啟發意義。